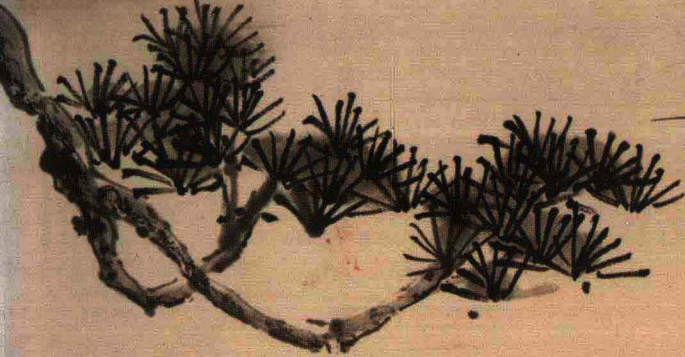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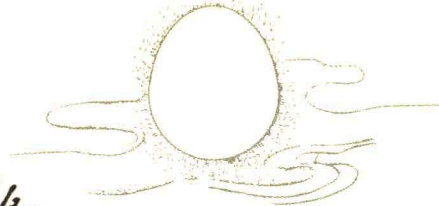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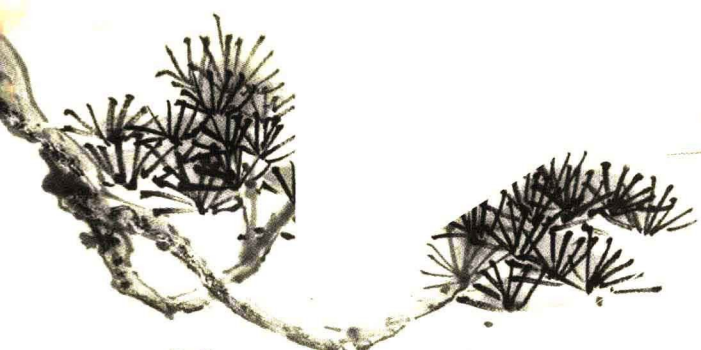


王德裕文集

王德裕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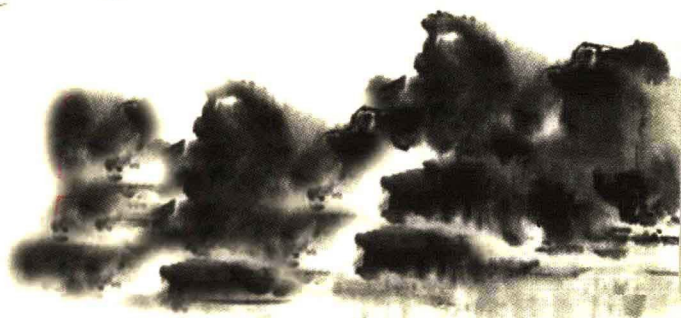
河南人民出版社



王德裕文集

王德裕 著

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重庆市重点学科 重庆师范大学专门史 资助出版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王德裕文集 / 王德裕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215-06078-4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先秦哲学—文集②古典
哲学—中国—汉代—文集 IV. ①B220.5-53②B234.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6718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黄委会设计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300 千字 印数 1500 册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自序(一)

经过近三十个春秋的学习、探索,拙作《先秦哲学史论》终于有幸奉献到了读者面前。借此机会,谈谈我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缘起及一些不成熟的体会。

我在青少年时期是热衷于工业救国的,因此读的是土木专科。抗战胜利后,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投入了当时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白色恐怖一来,在学校呆不下去了,工业救国的愿望也就成了泡影。之后,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我如饥似渴地读了一些当时所能找到的马、恩、列和毛主席著作,以及许多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于是我的兴趣转到了社会科学方面。同时,在斗争中也深感在中国人(包括自己)身上压着沉重的封建历史文化重负,产生了研究、清理中国传统文化的愿望。但由于当时斗争极为艰苦,生活很不安定,哪里还谈得上坐下来潜心研究,这个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

建国后,起初我在党政群部门工作,1958年转到高校。不久,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我也受到冲击,靠边站了。真是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倚”,这时我可坐下来认真读书了,于是开始废寝忘食地从事中国哲学史的学习、研究,即使像在“文革”期间那样恶劣的处境,也没有松懈。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得到新生,我个人的处境也有改善。心情是舒畅的。由于工作任务繁重,只有尽量挤休息时间从事写作,日子是过得够苦的,但能把先秦几个主要

的哲学流派及其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清理一遍，总算有了一些慰藉。然而三十年的岁月不算短，仅仅奉献出这么一点东西，又是使我感觉惭愧的。

毫无疑问，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坚持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坚持从历史事实和可靠的材料出发，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在具体的实践中，我有如下体会：

第一，必须把思想家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具体分析。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必须遵循的原则。传统的“唯物进步，唯心反动”的观点，不一定符合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实际情况。我在研究中经常发现，同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但阶级立场却不一样；而同一阶级的哲学家，在哲学观点上又迥然不同；即使同一阶级、同一营垒的哲学家，虽有共同的属性和阶级立场，但也存在着不同的个性，表现出自己鲜明的特色。这就需要我们突破传统的见解，避免人云亦云，对各个哲学流派或哲学家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比如孔、孟，传统的见解是将他们混为一谈的，其实孔子自孔子，孟子自孟子。孔、孟虽然都是唯心主义者（孔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者，孟子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但在阶级立场上却不一样，孔子是氏族奴隶主贵族的改良派，孟子则是由氏族奴隶主贵族转化过来的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又如孟子和商鞅的阶级立场是基本一致的，各自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两翼，但他们的哲学观点却不相同。再如墨子，学术界一般认为他是小生产者的代表，我认为他同商鞅一样，都是由庶民上升的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都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当然在理论表现上也有各自的特色。还有惠施和庄周，无论

是阶级立场、哲学观点或是人生态度等等方面都是不同的,但有的著作却将他们混为一谈,完全抹杀了他们之间的差异。这类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我们研究古代哲学流派及其代表,如果看不到他们之间的差异、对立和各自的个性特征,或者反过来看不到他们的相互依存和渗透,都违反了唯物辩证法,都是犯了形而上学的简单化、片面化的毛病。

第二,要注意总结前人失足的理论思维教训。列宁说,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生,不仅有社会历史根源、阶级根源,也有认识论根源。因此我们在分析研究某个哲学流派或哲学家时,仅仅指出他们是唯物或唯心是不够的,还须分析他们失足的理论思维教训,看他们是在哪些地方失足,又是怎样失足的。比如孟子、老子、庄子、公孙龙等等失足的教训,就很值得研究。孟子和老子是通过不同的思维途径倒向唯心主义的,庄子和公孙龙也有各自失足的认识论上的原因。总结他们失足的理论思维教训,对于锻炼和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是有好处的。恩格斯曾指出,要发展和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这是有深刻道理的。我在评介唯心主义哲学家时,着重分析了他们失足的理论思维教训,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第三,中国古代哲学有经世致用传统,许多思想家的哲学观点往往与他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等观点交融在一起,需要剔抉发微,披沙拣金,将他们的哲学思想发掘出来,加以分析研究。学术

界有的前辈说：“商鞅没有提出什么哲学思想。”（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第 374 页）其实商鞅的哲学思想相当丰富。其他思想家也有类似情况。

以上这些，也可说是我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指导原则和方法。我是力求这样做的，但限于学识和囿于己见，结果如何，只有请学界同仁和读者赐教了。

本书收录的文章，从时间跨度看长达三十年，不免打上当时的时代烙印。为了存真，此次付梓，除了个别文字修改外，未作大的改动。

在当前情况下，出好书难，出版学术著作尤难。因此我要感谢重庆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本书是不可能和读者见面的。

1991 年 2 月

自序(二)

我本是学土木工程的,因时代需要,兴趣转移,遂弃工学文。所以我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实在是“半路出家”。在向老一辈学者学习治学方法的过程中,积四十多年的摸索,有了一些感受和体会。除了在《先秦哲学史论·自序》中说过的一些以外,再作一些补充。

首先,我把学习、研究的重点摆在封建时期的中国哲学方面,这是有原因的。中国的封建时期最长,从春秋战国到鸦片战争前夕,延续了两千多年,如果加上鸦片战争迄至新中国建立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就更长了。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既创造了灿烂光辉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积淀了太多的历史的糟粕,对中国走向民主法治,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封建的皇权思想(家长制是其变种)、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宗法意识、中庸守旧的心理状态等等,无不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心理趋向。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提倡民主共和,使中国人民开始觉醒。以后又爆发了高扬“民主和科学”旗帜的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在神州大地还是有人想当皇帝,或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而且大大小小的“皇帝”——军阀、恶霸、豪绅、贪官污吏、帮派头目等等,层出不穷,要人民向他们顶礼膜拜,进贡献纳,刮取民脂民膏,视人民为

奴隶。以致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要郑重提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5页）因此，研究封建时期的中国哲学，不仅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清理传统文化遗产，必须区分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批判的本义，就是对事物进行研究、分析、检讨和判断，不是全盘否定。只有通过批判，才能分清传统文化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从而吸取其有价值的合理的部分，建构出新的思想理论。例如荀子，他若不批判地继承、改造先秦许多流派的思想学说，就不可能创造出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哲学体系。现在有人将批判与继承对立起来，认为批判会妨碍继承，要继承就不能批判，这是不对的。它只能使我们抱残守缺，退回到老祖宗那里去。这样，哪里还有什么革新、进步，哪里还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其次，研究对象也应有取舍。（1）我不是写哲学通史，因此不能对各个时期主要的哲学家一一论列，只能选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发展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正面的或负面的）的思想家进行研究。例如商鞅和陆贾，一般哲学史著作是不论列的。但我认为，商鞅帮秦孝公变法，使秦国大治，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又如陆贾，生在西汉初年，当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总结秦王朝短命而亡的教训，适应形势的变化，采取新的政策，以稳定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陆贾便是提出作这种战略转变的第一人。他对汉高祖说，“马上取之”，不能“以马上治之”。夺取政权可用暴力（“逆取”、“马上”），巩固政权就只能采取“文武并用”

的“顺守”策略。这一思想对巩固封建地主政权起了巨大的作用。尽管他们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但在他们丰富的政治经济主张中,包含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哲学思想。所以,我专门作了评述。(2)有些哲学家或哲学著作虽然影响很大,但因没有新鲜的东西,也略而不论。如公元79年东汉章帝亲自主持召开“白虎观”会议,“讲议五经同异”,后由著名史学家班固编撰整理成《白虎通义》。这部钦定的官方著作,对后代影响很大。但它没有什么新义,基本上是董仲舒神学唯心主义的翻版,因此未加评论。(3)“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别人说过的再说一遍也没有意义。因此学术界已有定论的一些哲学家及其著作(如孙子、扬雄、仲长统等)都未论列。当然,对前辈哲学史家忽略了的,或论之不详的,我也作了一些“补苴”工作,如后期墨家、荀子、《易传》、贾谊等的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我都专门作了介绍和评论。另外,学术界争论较大的如墨子、孟子的阶级倾向,我也将自己的看法写了出来,请方家教正。

第三,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事物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哲学思想也不例外。先秦时期,诸子百家蜂起,异彩纷呈,斗争非常激烈,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就是两汉,也存在着进步与后退、唯心与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们互相渗透、互相汲取,发展自己的学说。如荀子、陆贾、贾谊、董仲舒等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儒家,刘安、王充等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道家了。因此,我将他们对比起来加以分析研究。如对待孔子与墨子、墨子和孟子、后期墨家与庄子及公孙龙、荀子和先秦诸儒、韩非和吕不韦,以及董仲舒和刘安、王充等,我都是这样做的。或许这样,有助于弄清他们各自的本来面目,显示出其著作的时代理论特色。

第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解剖要有手

木刀，观察细菌要有显微镜。同样，搞学术研究也要有自己的理论武器。为了便于参照，我阅读了不少西方哲学名著，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到贝克莱、卢梭、狄德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等（当然都是译本）。我发现只有马克思主义继承了人类思维的全部优秀成果，是思维科学的最高成就。只有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去分析、解剖、研究中国哲学，才能看清中国哲学的发展轮廓，不致越弄越糊涂，如堕雾海中。现代西方的许多哲学流派，诸如柏格森主义、杜威、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以及罗素的逻辑实证主义等方面的著作，我也硬着头皮看了一些。但我觉得，作为一种认识科学和思维科学，把它们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相比，就如同用木棒、大刀去和机枪、大炮比较杀伤力一样，不可同日而语。作为进行学术研究的理论武器，我认为还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好，有效，管用。

最后我要说的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出版纯学术的著作是很困难的。承重庆师范大学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使拙作得以问世，谨致谢忱。我也希望读者不吝赐教。没有切实而中肯的学术批评，没有百家争鸣，没有学术民主，新中国的学术是繁荣不起来的。

2009年3月

目 录

先秦哲学史论

先秦诸子的矛盾学说	(3)
再评孔子的政治立场	(10)
孟子思想的阶级实质	(18)
再论孟子	(36)
论《中庸》	(53)
略论荀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62)
论墨翟	(73)
略论后期墨家的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	(85)
也论老子	(96)
评庄周	(108)
论惠施	(119)
评公孙龙	(128)
《公孙龙子》译解	(139)
论商鞅的哲学思想	(192)
评韩非	(204)
《吕氏春秋》述评	(218)

先秦哲学史论·续

论《郭店楚简》中的老子思想	(239)
从《郭店楚墓竹简》论子思	(246)

从孔、墨对立看墨子的阶级倾向	(253)
论《易传》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	(262)
传统儒学不可能导向民主法治	(275)

两汉哲学史论

陆贾思想简论	(281)
略论贾谊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	(290)
论董仲舒形而上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299)
刘安与董仲舒	(309)
《淮南子》哲学思想述评	(316)
战斗唯物主义者王充为什么陷入宿命论	(334)

附 录

重庆师范学院院长王德裕说:要办好高等院校必须“一依靠 二民主 三自主”	(343)
如火如荼 惊心动魄 ——“一·二五”大游行和“较场口血案”琐忆	(347)
国统区学运的最后一战 ——回忆重庆“四·二一”学生运动	(351)
六十年前“市一中”大逮捕追忆	(356)
魏元光先生和中央工校 ——在承德石油高专魏元光教育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 ...	(361)
后 记	(368)

先秦哲学史论

YINXUN ZHIXUE SHILUN



先秦诸子的矛盾学说

我国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较早,大约产生于殷周之际的《易经》,将乾(天)和坤(地)等相反的卦列在一起,就已经包含有原始的阴阳对立思想。《易·泰卦》:“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这显然是矛盾转化思想的萌芽。西周末,周太史史伯对郑桓公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史伯认为,有了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才能“生物”。“同”则取消了对立面的差异,使事物的发展难以为继(“同则不继”)。可以说,史伯是以理性思维的形式第一次提出矛盾统一问题。春秋末年,范蠡对越王勾践说:“时将有反,事将有间。”“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国语·越语》)这就是说,天下事物都像日月运行一样,发展到顶点就会向它的相反方面转化。春秋末的晏婴也阐发了与史伯相同的思想,他说:“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就像厨师用各种调料做汤,音乐家用各种音调组成乐章一样。“同”则是没有差异的绝对的同一,如“以水济水”,“琴瑟之专一”一样。(《左传》昭公二十年)但是,史伯、晏婴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有一个共同的缺陷:他们都比较重视对立面的统一,而忽视了对立面的斗争和转化。这个缺点,被比晏婴稍晚的史墨克服了。史墨对赵简子说:“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这段话,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肯定了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是事物的普遍法则,即所谓“物生有两”;二是

矛盾双方的关系不是半斤八两、势均力敌的关系，而是有主有从，即所谓“有陪贰”，“各有妃耦”；三是矛盾双方的主从地位会发生变化，从而引起事物的转化。“君”可转化为“臣”，“臣”也可以转化为“君”，高岸会转化为深谷，深谷也可转化为丘陵，三代帝王的子孙现在都变成庶民了，一切都在向它的对立面转化。总之，史墨不但看到了对立面的统一，而且看到了对立面的斗争和转化。表明我国在春秋末期，朴素辩证法思想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了。

矛盾法则是辩证法思想的核心。春秋以降，诸子百家围绕对矛盾法则的认识，展开了论争，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有的深化发展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有的在探索中也产生了一些失误，有一些值得我们认真吸取的理论思维教训，这里简要地评介一下先秦诸子主要代表人物的矛盾学说。

（一）承认矛盾，而又要求矛盾双方均衡、和谐、稳定地发展，以防止质变和飞跃的孔孟中庸哲学

“中”的观念在殷、周时已经出现，它和“刑”、“德”结合在一起。到孔子，“中庸”被当作“至德”，成为人们立身行事的最高准则之一。子思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把“中庸”提升到世界观的高度，变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恒常存在、普遍适用的最高原理和根本法则。

“中”既不是如某些教科书所说的“调和”、“折中”，也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而是一种貌似辩证法而实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执两用中”（《中庸》第六章）的“两”是指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中”则是指矛盾双方的均衡、和谐、稳定。如果矛盾双方的均衡、和谐、稳定遭到破坏，一方的力量压倒另一方，以致引起转化，这就是“偏”，“中”的状态也就因之被破坏了。“无过与不及”，是保持“中”的状态的方式、方法。过了“度”（“中”），事物就转化了；不及“度”，事物还未发展成熟，又不可能具有现质。所以孔子说：“过犹不及。”他认为只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三十章），“在